

城镇庙会及其嬗变

——以武汉地区庙会为个案分析

梁 方

(湖北大学 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摘要]武汉地区的城镇庙会在历史演进中,显现出深远的社会性、整合的系统性、动态的承传性和开放的自组织性诸特征。由于明中叶后九省通衢大市场的逐步扩张,武汉庙会适应社会需要而迅速嬗变。尤其是汉口镇会馆公所商办庙会的兴盛,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武汉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武汉近代的城镇庙会在社会化过程中呈现的亚文化因素,也是应该给予充分关注的。

[关键词]城镇庙会;嬗变;武汉地区;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03)02-0093-05

现武汉地区含武昌、汉阳、汉口三镇及四郊辖区:江夏、蔡甸、黄陂、新洲等。武昌、汉阳,唐以降为地域政治中心,历为州府治所。而汉口自明中叶由汉阳析出后,以贸易市镇迅速勃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单独建制为夏口厅(同县,属汉阳府),继而由中心城市而地方城市;1912年改厅为县,遂与武昌、汉阳鼎立而三;后合而为武汉市。考察武汉城市化进程,尤其是考察汉口这一市镇原生型城市的近代际遇,我们感觉到城镇庙会、尤其是汉口镇的商办庙会,对武汉城市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虽历经曲折,仍顽强显示其与时俱进的诸多文化特征。

—

武汉的庙会发生在独特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它以鲜明的地方特色长期作用于三镇社会文化、社会心理、民间贸易、民风民俗等领域,因而具有深远的社会性。

江夏灵泉山庙市是武汉地区庙会的开篇之作,缘自灵泉古市。道光《灵泉山志》云:“灵泉古市自汉以还……至唐而渐盛。”唐天宝年间灵泉始建寺,随着庙事日渐繁忙,灵泉古市遂陆续增建店坊^[1],于是庙市与古市珠联璧合,成就了灵泉山一段辉煌的区域发展史。

在灵泉庙市喟喟独行之际,鄂州州治江夏县(今武昌区)、沔州州治汉阳县(今汉阳区)城外的乡镇庙会也卓有影响地开展起来。

黄陂木兰山庙会缘于道教的承传。明清以来,木兰庙会尤以一年一度的“亮子会”影响深远,不仅黄陂各城乡,而且四川、上海等7省市,天门、应城等24个县亦有亮子会。“平时亮子菩萨供在头人家里,农历八月朝山时,由头人扛着亮子菩萨上木兰山……民国24~25年间,每年有10万人之众朝山进香,高峰期每天有2万余人”^{[2](P498)}。而今,“仅新洲的亮子会,每年朝山的香客不下10万人次”^[3]。

新洲旧街镇的花朝会,明代已享誉赣、湘等省。花朝会祭奉棉花神,盖因新洲历来是盛产棉花之区,“农历二月十五,相传为花的生日,普遍只吃汤元,用汤元祭棉花神,有‘汤元大棉花球子大’的说法。旧街习惯在此其间举行庙会,开展物资交流”^{[4](P661)}。

蔡甸九真山庙会,曾以“九真庙……旱祷辄应”的祷雨迎神而闻名于宋(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但形成定制且影响深远的却是每年正月、八月的朝山进香^{[5](P178)}。

当乡镇庙会多姿多彩地展开时,城邑庙会却别有一番韵味。城邑庙会,历史悠久、影响深远者当以洪山宝通禅寺的天齐会为魁首。对天齐会的记述,散见于清季棣华馆生、素公及民国汪辉楚、蔡寄鸥的《洪

[收稿日期]2002-09-13

[作者简介]梁方(1976—),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大学人文学院2000级研究生。

山竹枝词》^{[6](P320-321)},足见其规模、影响极江汉一时之盛。与此并称为武昌庙会双壁的是长春观“迎春会”,又叫“燕九节”^{[7](P21)}。

当庙会还在小农经济的桎梏中自娱自乐时,汉口商镇崛起,带来了武汉庙会的第一次嬗变。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 年)到清嘉庆十八年(1813 年),汉口镇人口由 6975 人增至 129183 人^{[8](P24)},计 17 倍;而庙寺由 2 所增至 40 所左右,计 20 倍(嘉庆《汉阳县志》卷 33)。由于宗教场所与市镇扩张同步,不少地名往往也以驻地的宗教场所命名。嘉道时河街上雄峙的八码头(“廿里长街八码头”^{[9](P22)})中,竟有 4 个以寺庙冠名:关圣祠、五圣庙(亦称五显庙)、老官庙、四官殿;河街 38 个地名中,以寺、庙、殿、阁、庵、宫为名的就有 21 个^{[10](P77-87)};为此,范锴在《汉口丛谈》中列载汉口镇的“正街坊巷”之后,对“僧寺尼庵,亦藉以附焉”,专门详述了有影响的大王庙(“鹾商公建”)、天都庵(“鹾商公所”)等 16 座宗教场所,折射出寺庙与会馆公所、与城镇发展的关系。据考,武汉三镇历代仅寺庙(建国后不曾兴建)共计 338 所,汉口地区后来居上,竟占 165 所^{[11](P182)}。正是如此众多的宗教场所,演绎了颇具特色的各类庙会。徐志的竹枝词记录了雍乾之际汉口的关王会^{[6](P5)},叶调元的竹枝词记载了嘉道间汉口元宵灯会、东岳庙天齐会、三官殿金容大帝(天符神)出庙的迎神赛会^{[6](P50)}。咸同年间,盂兰会又大行于三镇,此会汉阳归元寺“进项千金当七月,为他每夜济孤魂”^{[6](P131)}。

咸同以降,国势如江河日下。《汉口小志·寺观志》载,民国肇始,汉口自兵灾后,寺观多遭焚毁,然旋灭旋兴。饶有趣味的是,该志将有地址的 85 所公所会馆列为寺观志之附,因为“公所会馆为各帮聚议之所,大半设有神座,春秋演古致祭,故附于志后。”在这里,作者对新的社会现象的理解与记载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17 世纪中叶,市场日趋繁荣,汉镇以各会馆公所奉祀的各业祖师、各地乡土神的迎神赛会最具特色。不少会馆公所本身就是祭祀场所,俨然寺庙,于是索性以寺庙堂观为名。民国 9 年汉口会馆、公所约 179 处,以寺庙堂观为名的就有 53 处(侯祖海《夏口县志》)。

汉口商埠的兴旺,繁盛了以会馆、公所为载体的各色庙会,而各色庙会又促进商埠走向新的繁华。历史上在汉镇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新安市场,就是由会馆公所凭“庙”而立、商民围“庙”而居、滚动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康熙七年(1668 年),徽商在濒临后湖的荒地上建起新安公所;康熙三十四年增建学堂、魁星阁等,易名新安书院^[12]。魁星阁香火鼎盛,其后以此为中心的商居逐渐扩大为新安街。与此同时,周边以药王庙(怀庆会馆)为中心的药帮巷,以西关帝庙(山西会馆)为中心的关帝街不断扩建并与其后的江西会馆等修建的行栈、作坊、商店及庙宇……汇聚而成著名的新安市场。纵观这一市场,与其说是贸易之所,不如说是集商贸、祭祀、娱乐为一体的大庙会。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的山西会馆既是素有秦晋之好的山、陕客商聚议之所,又是供奉关帝、财神、文昌诸神的庙宇和酬神演戏的娱乐场所。时汉上“庙宇随在竞胜,金碧照耀,惟西馆规模冠于丛构”,其迎神赛会为会馆重要内容,犹以一年三祭的“关帝会”轰动三镇。晋商经营日隆,赛会也盛极一时,于是围“庙”而居者日众,渐次集户成街,即关帝街。

与此相仿的还有怀庆会馆(即药王庙)。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河南来汉的覃怀药帮在居地药帮巷侧捐资建起药王庙,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八(药王生日)举行“药王会”。时会馆演戏酬神通宵达旦,朝拜药王者络绎不绝。“会”后选出第二年会馆的会长和理事^[13]。覃怀药帮自成品牌后,药王庙四周也由药帮巷衍生出药帮大巷、药帮二巷、药帮三巷,俨然汉镇第一药材市场^{[7](P499)}。无独有偶,嘉庆初年由湖南宝庆府诸县船帮建成的宝庆会馆,道光年间始建的万寿宫(即江西会馆,主祭在江西治水有功的许逊),进门也是迎神赛会之所^{[7](P395-396)}。各会馆、公所以“迎神赛会”为要务,虽是以追求经济利益为直接动因,但也是社会进化的必然结果,同时又促进了汉镇城区的发展。这种自然型的市镇扩张与武昌、汉阳作为行政城邑的有序布局大异其趣,既浑然天成,又大而无序。另一方面,汉镇商办庙会与同期武昌、汉阳的城邑庙会、城郊的乡镇庙会大相径庭,它驳杂、兼容、俚俗、开放;它游离于宗教信仰,更多地展现了世俗“经济人”的特点;它与经济互动,与社会互动,共同促进了武汉近代城市化进程。

—

庙会文化是不断丰富、不断嬗变的特有的物质—精神系统。在这个系统内,物质载体因蕴含精神内

涵而深邃,精神活动凭借物质载体而辉煌,两者共同构建了融信仰、商贸、艺术为一体的文化现象。

从物质文化角度看,庙会赖以存在的“时间”既蕴含了发端于庙事活动的宗教性,又体现了以合“天时”的民俗性:正月十五日,灯会,“四官殿与存仁巷,灯挂长竿样样全”^{[9](P43)};二月十九日,观音诞日,汉口大观音阁兴办观音会,“水墨轻衫红袖袄,观音阁里去烧香”^{[6](P7)};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诞日,洪山东岳庙及宝通寺兴办的天齐会尤具特色(任桐·沙湖志,1923);四月初八,佛诞日,归元寺举办放生会^{[14](P29)};七月十五日,盂兰盆会,三镇人分别在集稼嘴、南岸嘴、黄鹤楼一带放灯。从乡镇看,庙会活动更是经年不断。仅以黄陂木兰庙会为例,全年各种名目的大“会”竟达19次之多^[3],而小“会”更是不可胜数。

从庙会赖以生存的空间看,“地利”是它发生发展的物质基础,既包含自然景观的优美可登可临,又包括人文景观的深邃可鉴可赏。由于历史的积累,寺观往往成为书画、雕塑、建筑、园林等赖以附丽的宏大的艺术群落,最大限度地含蕴了他们生存时代的艺术哲学、艺术史观和审美趋向,具有可供游人评点的视觉艺术的显著特征。

庙会活动还具有比较显著的经贸功能。这个功能在农耕时代的乡镇显得格外突出。如新洲花朝会还有商品成交的习惯,这一习惯产生于明朝末期,至民初,集市规模愈来愈大^[15]。与此同时,服务行业也相伴而兴:戏台两座,日夜演出;茶坊、酒馆,鳞次栉比;测字算命的、摆棋摊的、玩拳习打的……,应有尽有,热闹非凡^[15]。在城邑,尽管庙会集市功能渐次弱化,但精神消费品的交易逐步出现:“宋人山水明人字,索价千钱买百钱。”^{[9](P59)}为休闲服务的行业、为迎神赛会服务的店铺也日趋发达,“顽灯赛会乐升平,纸扎绸包不性灵。欲向俗人夸古董,萃珍斋赁万年青”^{[9](P134)}就记载了萃珍玉器店玉刻“万年青”3盆、每遇迎神赛会即赁之的经营手段策略。

由于城邑得商品经济风气之先,人们观念的更新、需求的变化还带来了庙“会”的价值标准的嬗变:道光年间,尼姑开始利用起会敛财:“尼师生意靠裙钗,做会看经总进财”^{[9](P132)};咸同年间,归元寺盂兰会引人算计:“综算三旬经忏费,千金岂不余盈?”^{[6](P139)}在汉镇市场上,办“会”不能没有钱,“徽台扎彩演戏酬神,尤为热闹,然所费甚钜,不能岁岁为之也”^{[9](P51)}。为此“起会”者必须要赚钱和善于赚钱,山陝会馆正殿的一组对联道出“天机”:“慕管鲍高风出秦关渡汾河共浮江汉而来千里平安利市更添三倍息;值春秋佳日奏鄖曲效楚舞兼采萍蘩以献一堂礼乐尽诚联报十分恩。”赚钱办庙会,以庙会促赚钱,这正是近代商埠名商大贾、会馆公所以文化经商的滥觞。他们兢兢业业地发展会馆公所这个庙会载体,从光绪《山陝会馆志》中可体会到他们“尽诚联报十分恩”。

商品市场的发展是庙会嬗变重要条件。明清之际,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地区的庙会的商业集市功能逐渐淡化,尤其是迅速勃兴的汉口镇,经济繁盛所带来的城市化趋势,使它的庙会几乎成为全社会游乐之所。近代城镇的扩张与传统庙会的嬗变同步进行,于是经贸功能的淡化、宗教功能的弱化,城邑庙会只剩下借神娱人功能的强化了。

从精神文化的角度来看,庙会虽然附丽于物质载体而传播,但精神文化却是庙会的灵魂。武汉地区城、镇及各会馆公所尽管祭祀对象各不相同,但通过庙会整合和凝聚自己的社区或行帮,在发挥经济功能的同时,也满足各自精神消费却是一致的文化现象。精神文化也是一个系统结构,它由信仰、艺术、风俗等子系统组成。首先是信仰系统,其核心包括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观念,它是精神文化相对稳定的最重要的部分,发挥着重要的教化功能。庙会从通祀神的选择到乡土神的供奉,一直到容纳前代贤哲、民族英雄、甚至绿林好汉……这种对虚幻的“超自然力量”的祭祀,与其说是一种宗教,不如说是人们对民族的历史文化系统的阐释,对民族精英的崇拜,对美好生活的祈盼,对社会新的精神力量的张扬。会馆公所的“迎神赛会”所推崇的关公的诚信、许逊的智勇等更发挥了对商业移民的“以神道设教”的作用。

艺术系统是精神文化的中介层次,它为信仰服务,充当传播、演绎信仰的媒介。正是艺术的感染力,庙会无疑成为城镇全民的一道精神大餐,哪怕贫农平民也是乐此不疲:“屠豕人肥装太监,嬉头匠俏扮宫娥。”^{[9](P135)}人们宁可勒紧裤带也要捐钱参与会事,以慰心灵:“河灯一盏五文钱,底事街坊尽力捐……茅棚多少人枵腹,妻泣儿啼破袋空。”^{[6](P137)}

风俗系统是庙会文化赖以运行的轨道,是社会文化的约定俗成和代代相因。洪山天齐会(甘蔗节)以吃甘蔗的习俗传播着元末徐寿辉起义军以手持甘蔗者为内应而智取江夏的故事^{[7](P44)};蔡甸九真山庙会

以祭祀“大王”(即草莽英雄刘福通)的习俗闻名于清际^[5],足见庙会对新的社会心理的观照并能动地演绎为民俗传统,这正是庙会文化与时俱进之处。清以降,武汉地域的庙会、庙祭系列,“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现象更加突出。土地庙是乡村正祭的社坛,汉口镇的土地庙,均是樵耕渔猎之期的孑遗,然而直到民国22年,汉口市区内仍有人在祭祀土地庙,只是祈祝的内容与农耕之期的祈求大异其趣:“大董家巷土地庙香火最盛,每日持香楮盈盈拜祝如下者,皆沙家巷等处妓女为祝生意畅旺而来……”^{[6](P32)}

风俗使传统型庙会传之久远,也使商办庙会独树一帜。汉镇因商贾麋集,“则风俗易墮”^{[9](P1)},一时传统的庙会与商办庙会共存,土地庙与城隍庙同在,五路财神与各方神圣并行,其中尤以会馆公所的游神赛会纳四域之商俗,领汉上之风骚;同时商贾作为“首士”投资于社区的庙会也为一时之尚。反之,这诸多俗、尚又促使庙会之风愈演愈烈。

正是信仰、艺术、风俗的结合,才使庙会“形、神”兼备,成为娱神、娱人、惠民、安商的狂欢节,清季武昌城的元宵节五龙朝贺正说明了这一点:

在同治黄鹤楼未焚毁以前,百多年来的正月十五午时,武昌绅、商、民都在黄鹤楼前摆设香案,盛办灯会,历点烛、升表、奏乐、迎神等繁复仪式后,5条龙灯、1对狮子翩跹起舞,于是灯会在“一贺列位皓首翁,眼明身健耳也聪……二贺读书诸相公,书中自有粟千钟……三贺众位店主东,陶朱事业日方中……”的求福彩中进入高潮^{[16](P15)}。

三

民国肇始,政府总把控制庙会视为维持社会安定、纯洁社会文化的重要举措,曾多次“禁灯”,但都不了了之。1929年,三镇又重开盛大花灯会。即使在现代娱乐场所出现之后,庙会仍然是大多数市民能够接受的公共生活空间。

为什么貌似脆弱的庙会最终得以幸存并仍然不失为城市生活中最活跃的一部分?因为庙会作为一种与社会互动的系统,从时间上看,其发展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有当代的风姿;从空间上看,其存在既扎根于原生的遗传基因,又呈现再生的时代变异。它既是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产物,又是当代经济—文化的一部分。这种动态的承传性表现出超时空的统一,既源远流长,又海纳百川,因而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再塑性。

但凡庙会均延续着共同的遗传基因,三镇庙会相对于古代尽管有诸多变异,但仍然表现出对“信巫鬼,重淫祀”的延伸,对傩祭驱鬼逐邪的新诠释。尤其在庙会的城隍出巡之际,逐鬼攘灾的群演群乐更见古楚特征:“……神祠报赛爆竹声,鸣金击鼓先导行……忽肆狰狞幻鬼变,黄须之儿带铜面。刺以长矛接短兵,三叉路口成蚁战”^{[10](P130)}。另外,古楚乐舞无疑是三镇庙会歌舞娱乐的历史源头。原始祭祀中鼓乐歌舞一直是沟通人神两界的重要手段,三镇的迎神赛会多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散发出馥郁的南楚乡土气息;而商品流通带来各地文化的大交流,几乎使汉镇庙会成为展示南腔北调的大舞台:“徽班”进汉,“杂技”进城,昆曲秦腔、皮影花鼓……无不凭借这个舞台交流、演进:“逢人啧啧赞徽台”、“楚俗以木系足履地,行舞作戏,名曰高跷。试灯之节,赛会之时,皆集以群夸其艺……”^{[10](P130)}。难怪叶调元道:“名是敬神终为戏。”^[9]

承传既被动于原始自然基因的孑遗,又主动于后世社会因素所引起的变异,如此形成庙会开放的自组织性。自组织性是庙会的发展机制,庙会只有在开放的传播过程中不断接受社会各种信息,并通过自组织机制寻求各子系统间的动态平衡,才能维持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协调和求得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它的发展实质上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粗放走向集约、自组织的存在走向有组织的运作的嬗变过程。

历史上,一些庙会曾因自组织机制的脆弱在非自然因素的不可抗力下而变异和衰落^[17],但庙会更多的是在与社会新的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中,获得新的能量和发展机遇而嬗变。首先是商品经济因素的渗入、社会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使庙会的价值定向和存在方式都发生了适应性的深刻变化。清季,汉镇工商业的繁盛,使佛门净地开始出现市俗化的倾向。新的科技成果的吸纳改变了庙会的物质形态。上世纪20年代,电灯开始使用于三镇灯会,一变元宵节的旧风韵^{[6](P25)}。新的精神因素从历史到现实均赋予庙会以鲜活的灵魂。从自然神的选择到民间俊杰的确立,一方面庙会文化相对于官方文化具有更广泛

的自主性或自立程度;相对于内省自闭的精英文化更具有灵活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我们应该清醒看到,由于庙会文化相对于社会精英文化是俗文化,相对于官方主流文化是亚文化,因此它既有精英文化、主流文化的某些内容,又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定向和行为模式,庙会的自组织机制与主流社会的适应往往有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因此,随着社会的变化,庙会必须与时俱进。

(本文在构思与写作过程中得到导师郭莹教授的悉心指导,并提供了相关材料,志此以表感谢。)

[参考文献]

- [1] 邓国茂.灵泉古寺与龙泉圣地[J].武汉春秋,1993,(3).
- [2] 黄陂县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
- [3] 黎世炎.今昔木兰庙会[J].武汉春秋,2001,(1).
- [4] 新洲县志[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2.
- [5] 王仁佑.九真山话旧[J].武汉文史资料,1990,(1).
- [6] 徐明庭.武汉竹枝词[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0.
- [7] 肖志华,严昌洪.武汉掌故[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 [8] 武汉市志·总类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 [9] 徐明庭,马昌松.汉口竹枝词校注[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
- [10] 范楷.汉口丛谈校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 [11] 武汉市志·社会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 [12] 刘富道.武汉汉正街[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
- [13] 李佐荣,崔祥荣.“药帮”、“药帮巷”与“药王庙”[J].武汉文史资料,1989,(4).
- [14] 湖北省志·民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
- [15] 李华树,赵步云,洪泽民.新洲旧街的花朝会[J].春秋,1987,(5).
- [16] 徐明庭.元宵节的五龙朝贺[J].武汉文史资料,1993,(3).
- [17] 喻伟平.三镇的一次花灯盛会[N].长江日报,1988-03-01(4).

[责任编辑:梅 莉]

Temple Fair Of Cities And Towns And Its Evolution

LIANG F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ubei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62,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emple fair of cities and towns in Wuhan prefecture appeared many characteristics of profound social nature, complete systematicness, dynamical continuity and open self-organization. Since the nine-province thoroughfare market expanded gradually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Wuhan temple fair fit in with the needs of the society and evolved rapidly. Especially the population of temple fair supported by commercial guilds on Hankou town stimulated to a certain degree the development of commodity economy in modern times. On the other hand, also great concern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subcultural factor that Wuhan temple fair of cities and towns present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 temple fair of cities and towns; evolution; Wuhan prefectur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